



中国历史年表

明代庚戌之变和 隆庆和议

戴鸿义

中华书局

DA 11157

K248.52/2

11157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明代庚戌之变 和隆庆和议

戴 鸿 义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64038

目 录

一、从明初的塞北形势谈起·····	1
二、俺答的兴起及其同明朝的冲突·····	4
三、嘉靖庚戌之变·····	13
四、隆庆议和的前前后后·····	21
五、两族亲睦关系的新发展·····	31



864038

我国很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。在历史上，虽然各族之间往往产生不和以至冲突，但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，总是推动着各族关系趋向和好亲睦，这是民族关系史中的主流。十六世纪时，蒙古族领袖人物俺答同明朝打了多年的仗，在1550年（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即庚戌年）还率众攻到北京城下，酿成了“庚戌之变”。然而经济交流和政治安定的需要，终于促使双方在1570年（明穆宗隆庆四年）达成和议。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，后又封他的妻子三娘子为忠顺夫人。俺答和三娘子忠诚不渝地信守和议，始终服属中央朝廷；长城一带，汉蒙两族和睦相处，交往频繁，塞外安宁，几十年不闻金戈之声。从庚戌之变到隆庆和议的这段历史，体现了民族关系的主流，是很值得我们重温的。

一、从明初的塞北形势谈起

明王朝建立的第一年，1368年（洪武元年），在南京称帝的朱元璋派大军北伐，顺利地攻占了元朝的京师大都城（今北京），元朝的末代皇帝——顺帝带着皇

室退居塞北的应昌(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)。元顺帝死后,他的继承者将驻地 from 应昌北移和林(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哈尔和林),仍沿用元的国号,称皇帝。为了把它同顺帝以前的元朝区别开来,有的史籍上就称这个地方性的政权为“北元”。至1403年(明成祖永乐元年),鬼力赤杀北元主坤帖木儿,才废掉元的国号,改称鞑靼[dá—dá达达],鞑靼最高首领也不再称帝,改称为“汗”。此后,蒙古各部失去统一的中心,分成为三大部:

鞑靼: 这个族称早在唐代就出现了。明代的鞑靼则指元皇室后裔所统率的各部,居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和克鲁伦河流域以及贝加尔湖以南广大地区。

瓦剌: 在鞑靼部的西北,居于蒙古高原以西直至额尔齐斯河流域。

兀良哈三卫(福余、泰宁、朵颜): 在鞑靼部的东南,居于东北的辽河、西辽河和老哈河流域。

明朝初年,退居蒙古草原的元皇室残余势力同明朝对立。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一再派兵北伐,逐步统辖了北部的广大地区,最北达到外兴安岭。为了加强对北方的控制,明成祖于1421年(永乐十九年)由南京迁都北京。在长城以北蒙古部落集中的地区,明朝设立了卫所(明代省以下的地方军事机构)二十多

处，由当地蒙古族首领为各卫所主官，任以都督（副职为都督同知、都督僉事）、指挥使（副职为指挥同知、指挥僉事）、千户、百户和镇抚等世袭官。鬼力赤以后，蒙古三大部互不相统，各部内部也不统一。蒙古三大部都曾接受过明朝的封爵，承认明廷为中央政权，经常到北京朝贡，得到朝廷的赏赐，并在一些长城关口进行贸易，称为互市。但这种臣属关系若即若离，各部一旦势力强盛，便往往南下掳掠。明朝初期，国势强大，对北方地区的统辖比较稳定；中叶以后，国力渐弱，就给了蒙古各部封建主以可乘之机。1449年（正统十四年），瓦剌首领也先大举南犯，在土木堡（今怀来东）俘虏了御驾亲征的明英宗，这就是有名的“土木之变”，它发生在“庚戌之变”前一百年。

十五世纪后期，鞑靼部兴起。鞑靼首领巴图孟克称达延汗，征服了瓦剌和兀良哈部，把大漠南北蒙古三大部大体上统一起来。达延汗死后，他所统辖的各部又趋于分裂。到了十六世纪初期，分裂的蒙古各部，乘明朝统治力量削弱之机，频频南下侵掠，长城已成为明中央政权阻遏蒙古地方势力南下的军事防线。明朝一再修缮和加固长城，在长城一线先后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，或称九边。九镇总兵官的驻地如下：辽东镇，驻广宁（今辽宁北镇），后移辽阳；蓟（jī）州镇，驻三

屯营(今河北迁西西北);宣府镇,驻地在今河北宣化;大同镇,驻山西大同;山西镇,也称太原镇,驻山西偏关,后移宁武;延绥镇,也称榆林镇,驻地初在陕西绥德,后移榆林;宁夏镇,驻地在今宁夏银川市;固原镇,驻地在今宁夏固原;甘肃镇,驻地在今甘肃张掖。

到了十六世纪中叶,在蒙古地方势力中,鞑靼部领袖人物俺答,部众最为强盛,成了明王朝在北部地区的主要对手。

二、俺答的兴起及其 同明朝的冲突

俺答,史书上或作谿达、阿勒坦,生于1507年(明武宗正德二年)。他是达延汗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吉囊的次子。吉囊(或作济农)是蒙古语音译,意译为“副汗”或“亲王”。1531年(明世宗嘉靖十年)巴尔斯博罗特死后,长子袁必里克墨尔根继承吉囊之位,统辖鄂尔多斯领地(在今内蒙伊克昭盟),次子俺答则分辖右翼土默特(或称十二土默特)领地,在今呼和浩特一带。1542年(嘉靖二十一年)袁必里克墨尔根死后,他的部众分属于几个儿子,力量分散,俺答势力日盛,成为十六世纪中后期蒙古族中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,史书上

多称之为俺答汗(或作阿勒坦汗)。

俺答驍悍勇敢，善于骑射和用兵打仗。当时蒙古各部封建主不时率众到明九镇地区，抢掠财物，还俘虏人口作为奴隶，俺答也不例外。1532年(嘉靖十一年)，俺答和袁必里克墨尔根率三万骑南犯延绥镇地区，这是较早的一次。这种掳掠行为，不仅给当地汉族人民带来了祸害，也使蒙族人民蒙受损失。因为不断的武装冲突，除了造成人员伤亡，也中止了和平的贸易关系，蒙古部落一向通过互市而从中原地区获得的金属器具和各种纺织品，便失去了来源。俺答不同于许多蒙古部落首领的地方，在于他比较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，因此，他多次主动地向明朝朝廷提出：愿意臣服于明朝，要求明朝赐给他封爵，允许他按时进贡，并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贸易。

1541年(嘉靖二十年)七月^①，俺答派遣使人到大同的阳和口，提出了通贡的要求，声言如果不答应的话，还将率骑南下。明廷不了解俺答是真心要求通贡，武断地认为“寇情多诈”，拒绝了俺答的要求，甚至悬赏购求俺答的头。这样做，当然激怒了对方。八月间，俺答偕其兄南犯山西的朔州(今朔县)、石州(今离石)一带，“杀掠甚惨”，至九月初旬方退。

① 本书中所记月日，都为旧历。

第二年闰五月，俺答又派使人石天爵到大同地区，再次提出通贡要求。大同巡抚^①龙大有为了冒功，竟诱捕石天爵，向朝廷谎报用计俘敌。兵部^②讨论，又硬说俺答“叩关申请”是故施奸计。结果，嘉靖帝下令将石天爵处以残酷的分裂尸体的磔刑。这一来，无异火上加油，更激化了双方的矛盾。俺答从六月起，大举进攻山西地区，一连几个月，一直打到晋南的沁州（今沁县）、长子县等地。1543年，1544年，1545年，又连犯延绥镇、大同镇和宣府镇地区，使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的损失。明朝政府损兵折将，还耗费了巨额的军费。

明朝官员中有识之士，鉴于长期冲突所带来的严重后果，主张答允俺答提出的给以封爵和进行贡市贸易的合理要求。1546年（嘉靖二十五年）五月，俺答再一次派人到大同，提出了上述要求，表示：“自议和后牧马塞外，不敢侵扰”。当地总兵官^③的家丁董宝等又抄袭过去杀石天爵事件的故智，为冒功而擅杀来使。当时任宣大总督（总督宣府和大同两镇军务）的翁万达得知

① 明代的巡抚和总督原为临时派赴地方的朝廷大员，后成为常驻某一地区的军政长官。总督的职位高于巡抚。

② 兵部为中央朝廷六部（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）之一，正副长官为尚书和侍郎。

③ 明代总兵，初为临时派遣的、统率作战部队的主将；后成为常驻一地、镇守一方的统兵官，其下属有副总兵（副将）、参将、守备等。

此事后，上奏朝廷说：过去诱杀石天爵，是有关官员失计，现在俺答又请求通贡，即使不答应，也应妥善地遣返来使，而竟加以诱杀，这是没有道理的。他奏请严惩董宝等肇事者，依法判处死刑，并在关口公布告示，对俺答“明告以朝廷德意，解其蓄怨构兵之计”。但是嘉靖帝不允所请。此后翁万达又两次上书。他针对朝臣中认为俺答之言不可信的这种说法，指出俺答再三要求通贡，并不是谎言，而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，因为俺答通过贡市贸易可以得到大量的赏赐。他还具体建议：可以限定派遣贡使的时间、地点和人数，如俺答不答应照办，那末拒绝通贡就有理了。对此，嘉靖帝不加批准，反而训斥他多事。

在当时的情况下，翁万达既主张允许俺答议和通贡，又重视加强防御，这是正确的方针。嘉靖帝不允许俺答通贡，准备兵戎相见，所以对翁所提修缮长城、加强战备的建议还是积极支持的。1546—1547年，在翁万达主持下，在大同和宣府两镇的北面，修筑了长城一千余里，用砖石砌成，城高墙宽，改善了这两镇的防务。这千里长城至今大部仍保持完好。

嘉靖帝坚持不允俺答和好通贡的要求，导致了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。1546年五月明廷再一次拒绝通贡后，不久，鞑靼铁骑就攻入陕西延安府，一直打到

西安附近的三原、泾阳等地，杀掠人畜无数，又西至庆阳、环县一带，以致“庆阳一带，断绝人烟”，当地人民深受其祸。这些事实，既证明了明廷决策的错误，也暴露了俺答作为游牧部落封建领主的掠夺性。

俺答的领地原在河套以北大青山一带，但后来又经常率众在河套地区活动。从十五世纪中叶以来，鞑靼各部就入占河套，作为放牧之地；明朝统治力量日弱，也无力顾及。河套东面紧接大同镇，南面为绥德镇和固原镇，西面为宁夏镇。鞑靼占据河套，成为对明朝北部地区最严重的威胁。1546年冬，总督陕西三边（指延绥、甘肃、宁夏三镇）总督（驻花马池）曾铣提出了关于发动进攻、收复河套的八条建议。

从军事战略着眼，收复河套是必要的。因为鞑靼占据黄河以南的河套，明军就失去了黄河天险；收复河套，才有利于战守。但曾铣急于事功，他提出“以锐卒六万，益以山东枪手二千，每当春夏交，携五十日饷，水陆交进，直捣其巢”，作为“一劳永逸之策”，则是一种冒险轻进的行动计划。鞑靼部入居河套已近百年，套内及套北有部众几十万，河套草原又利于蒙古骑兵驰骋，而明军的火器则不易发挥威力。曾铣想以六万兵力去歼灭人数众多的迁徙不定的鞑靼骑兵，显然是难于奏功的。1547年（嘉靖二十六年）五月，曾铣偷袭河套的鞑

鞬，所谓大胜而回，也不过杀敌二十七名，生俘一人而已。

曾铣收复河套的目标是无可非议的，而收复河套的轻进计划则是不足取的。老成持重的翁万达曾就此提出异议，认为首先应该竭力加强防御，而不应该在历年战事、疮痍未复的情况下，去主动进攻，“横挑”强敌。但当时的首辅、内阁大学士^①夏言积极支持曾铣的计划，于是嘉靖帝也加以赞同，并拒绝了翁万达的合理意见。

1547年十一月，曾铣又上疏提出了恢复河套和加强防务的十八条建议。嘉靖帝加以嘉奖，朝臣也遵照嘉靖帝的旨意，表示完全赞成曾铣的计划。但时隔不久，到1548年（嘉靖二十七年）一月，嘉靖帝忽然改变了主意，他对内阁的大臣们说：“现在征伐河套的鞬，不知是否师出有名？军饷是否充分？能否必定成功？一个曾铣算不了什么，但打起来老百姓受祸怎么办？”

本来积极支持曾铣的嘉靖帝为什么变卦了呢？原来这里牵涉到统治集团内部严嵩同夏言的夺权斗争。嘉靖帝是历史上有名的荒淫无度的昏君。他长期不理朝政，深居宫苑，崇信道教，求仙炼丹，妄求长生不

① 明中叶后内阁为中枢机构，大学士为执政大臣，首席大学士即首辅，相当于过去的宰相。

死。夏言为首辅时，嘉靖帝偏听偏信，一任夏言专断朝政。1542年（嘉靖二十一年），夏言把他的同乡严嵩引进了内阁。严嵩表面上十分尊崇夏言，暗地里却处心积虑地图谋夺取首辅的职位。严嵩靠着善于察言观色的本事，竭力逢迎嘉靖帝，还用黄金收买了嘉靖帝左右的宦官帮他说话，因而愈来愈被嘉靖帝所宠信。

严嵩鉴于夏言大力支持曾铣收复河套的计划，就策划在这个问题上扳倒夏言。他指使兵部尚书王以旂竭力奏言“套不可复”。他在嘉靖帝面前说了曾铣不少坏话，攻击曾铣“轻开边衅”，诬蔑夏言勾结曾铣、败坏国事。嘉靖帝性既暴戾，识又卑陋，他开始听夏言、曾铣说收复河套有把握，可以安定北方，有利于他的统治，就加以支持了。现在听严嵩陈述收复河套的种种困难和夏、曾的许多不是，他的态度就动摇起来了。封建时代宗教迷信盛行，常常把天然界的灾异同现实政治联系起来，把灾异说成是上天示意。当时陕西澄城山崩，京师大风，严嵩借机奏称这些灾异的发生同夏言擅权和曾铣开衅有关。嘉靖帝终于听信了严嵩的谗言，在1547年一月里下令逮捕曾铣进京问罪，同时把夏言罢了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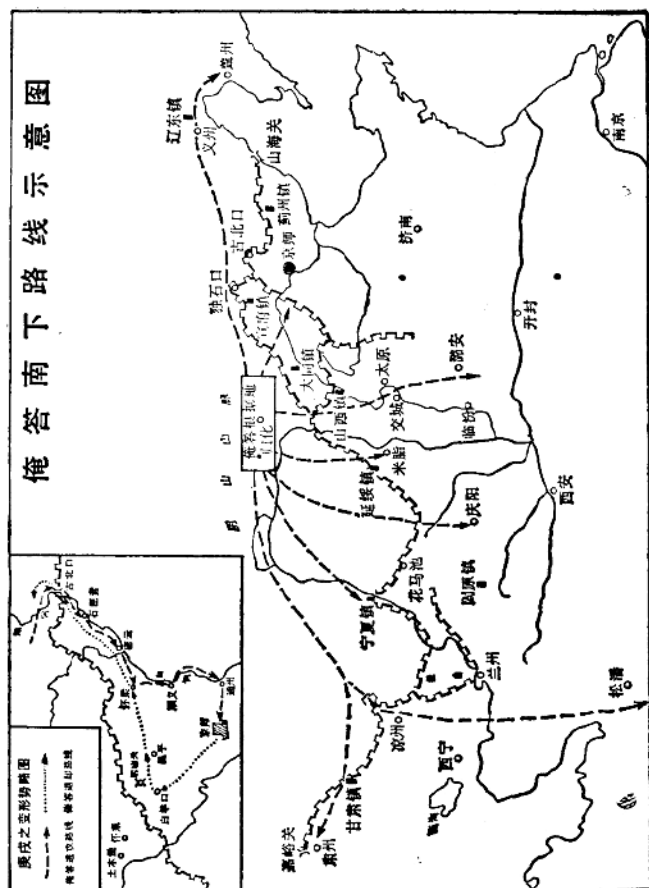
夏言一倒台，严嵩取代了首辅之位，但他并不因此罢休。正月天寒，俺答乘黄河冰封，率众渡河，进入河

套，有进犯延绥、宁夏镇之势。严嵩又以俺答入套是曾铣开衅所致来激怒嘉靖帝。接着，严嵩还代替被曾铣奏劾而革职的前甘肃总兵仇鸾作奏，诬告曾铣掩败不报、克扣军饷。三月间，曾铣被嘉靖帝下令处斩，他的妻子也被流放二千里外；已罢官的夏言同时被捕入狱。同年八九月，俺答进犯大同和宣府镇，“杀掠数万”，一直打到怀来县，京师震动。十月间，严嵩乘机向嘉靖帝进谗，说俺答这次南犯，是直接对于夏言和曾铣要收复河套的“报复”。嘉靖帝信以为真，立即下诏把夏言处死。

曾铣和夏言力主收复河套，这个目标并没有错，他们的过失在于缺乏切实可行的计划，急于求成。他们蒙冤被杀，完全是由于嘉靖帝听信了严嵩的攻讦和中伤。此事引起朝廷内外一片恐惧，此后再没有一个人敢提出收复河套的事了。

夺得了主政大权的严嵩，代表了明朝封建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。他交结奸党，打击比较正直的官员，滥肆搜刮，贪婪成性。单是每年户部用于九镇的军费就有十分之六落入严嵩一伙的私囊，直接影响了九镇的防务。严嵩作为首辅，公然反对收复河套，对俺答畏之若虎，更使一些将领不敢积极备战。这样，就给俺答发动更大规模的南侵造成可乘之机。

图 示 线 路 下 南 答 俺



三、嘉靖庚戌之变

1550年(嘉靖二十九年)夏,俺答驻扎在大同镇塞外的威宁海子(今内蒙兴和附近)。六月间,他率领骑兵越长城南下,把精兵埋伏在山林中,然后以少数老弱骑卒来诱引明军。大同总兵张达果敢勇猛,但短于谋略,他获悉俺答兵入关,没有等大部队集合,就匆匆带领二百名轻骑赶赴前线迎击。由于轻敌中伏,张达孤不敌众,奋战而死,副总兵林椿闻讯来救,也中箭牺牲。俺答发动的这次战斗,是大规模进攻前的一场试探。他在战斗得手后退到塞外,自威宁海移驻断头山一带,调来在河套的部众,集合了骑兵十余万,准备大举南下。

张达战死后,仇鸾任大同总兵。仇鸾的祖父仇钺靠在1512年(正德七年)镇压刘六刘七农民起义而封侯。仇鸾承袭了咸宁侯爵位,原为甘肃总兵,因有贪虐行为而被参革,这时靠贿赂和巴结严嵩而重新起用。七月间,仇鸾得知俺答调集部众、图谋进攻大同,恐惧万分,竟派人送重金给俺答,乞求俺答不要进攻他所管辖的大同镇而移军其他地区。俺答接受了重贿,与仇鸾私下订约,便把进攻矛头移向东边的宣府镇。

八月初三日，俺答攻打宣府镇的两河口，遭到明军有力的抵抗，无法前进，又移兵进犯宣府东面的蓟镇地区。十四日，俺答部沿潮河南下，迫近古北口。十六日，他派出数千骑兵，诱引古北口守兵出关作战，同时另遣一支精兵，偷偷地绕道到了明军守备不严的黄榆沟，拆毁长城城墙，攻入明军的后方。明军受到突然袭击，狼狈溃败。俺答乘胜南下，当天就由石匣营（今密云水库东北）经密云而打到怀柔和顺义境内。十七日，进抵通州。当时正值白河汛期，水势很急，明军又把船只全部转移到了西岸，俺答军一时无法渡河，暂与守河西的明军隔水相持。

俺答兵南下之初，警报即传至北京。嘉靖帝在宫中作乐求仙，一向不爱听什么坏消息。兵部尚书丁汝夔怕触皇帝之忌，丢了自己的乌纱帽，起初也就不敢把军情呈报嘉靖帝。鞑靼骑兵一逼近京师，北京城里一派惊乱，嘉靖帝更是惊恐。当时京师官兵从花名册上看，有十四万人，但各级将校为冒领饷额而虚报兵员，实有兵数不过五、六万人，其中还包括不少老弱残兵，正如史书所载，“支粮则有，调遣则无”。嘉靖帝除下令京师戒严，命仇鸾率大同镇兵二万驻守居庸关外，又征调较近的保定、延绥、蓟州、河间、宣府、山西各镇兵入京应援，以上七镇兵共五、六万人。此外又征调河南与

山东兵陆续来京援救。嘉靖帝命仇鸾为平虏大将军，统率调至京师的各路官军；又以保定巡抚杨守谦为兵部左侍郎，协助兵部尚书丁汝夔总督守卫京师的军务。朝廷大臣分头率兵守御京城九门、皇城各门及城内外各交通要道并督巡五城（东南西北中五个城区）。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千余名武举人，也被征登城守御；如后来成为抗倭名将的戚继光，当时正应试入京，就被委为传达命令的总旗牌官，参与了守城之役。

京城虽然经过一番部署，但仍笼罩着惊恐的气氛。京营官兵长久缺乏训练，没有作战的经验，许多官兵一听要打仗，吓得涕泣不止。京师军备不足，而管理武库的太监竟按照向来的陋规，在军队领取武器时趁机敲诈勒索，以致不能迅速把甲仗武器发给士兵。各路援军奉令急速来京，给养供应不上，士兵们饿着肚子守城。官兵军纪本来不好，这时，抢劫百姓衣物食品之事更是经常发生，尤以仇鸾的大同兵祸民最甚。仇鸾对部卒的抢掠行为从来不予制止，兵部尚书丁汝夔慑于仇鸾的权势，对大同兵百般包庇，甚至通知地方官不得逮捕违犯军纪的大同兵。官兵害民，民恨官兵。这些情况，充分暴露了明朝朝政的腐败，以致在俺答进攻面前显示了软弱无力。

八月二十日，俺答军在通州渡过白河，西犯京城，